

东南亚历史译丛

(第二集)

中山大学东南亚历史研究所

探索东南亚的历史

休·廷克

本刊编者要我探究一下近二十年发展起来的东南亚历史一些新的概念的形成过程。回忆往事，不禁想起了一些早已遗忘了的问题。

二次大战后，作为伦敦远东、非洲研究学院的早期的“出人意料”的发展项目之一，在“非语言”学系的著名历史学系里增设了课外科目的教师。1948年，两名年轻人被任命担任东南亚史讲师这一新的职务，一个教古代和中世纪史，一个教近、现代史（过去，该学院一直不把这一地区的历史列入教学）。这两名年轻人刚分别在牛津与剑桥历史学院获得学位，该二学院把东南亚（实际是整个第三世界）仅视为扩大了欧洲一个虚幻的部分。这两名不够专业教师资格的新手可以声称曾在该地区旅居过，担任过他们预料不到的专业人员，如军队的临时军官，由军队授给新编职称，或在东南亚盟军总部指定的地区服务过。

这两名先驱者愿意从事东南亚史的教学，并非予兆他们的研究项目有美好的前景。一年后，东南亚古代与中世纪史的讲师乔治·贝纳特辞职了，宣称他的课程已不存在了。后

来，他成为一位公认的东非研究权威（可惜他未到中年就死去了）。东南亚现代史的讲师（即本文作者），尽管在他事业周围布满了日益增多的难题，但还是继续坚持了下去。学院要求他兼任古代与中世纪史的讲师，这时，他开始怀疑：他是否能使选修这一课程的少量学生明瞭他的讲授呢？他在讲授从伯希和、戈岱司或马司帛洛的著作中辛勤收集来的有关阇耶跋摩一世、阇耶跋摩二世的材料时，他能向这些年轻的印度人、缅甸人或新加坡的姑娘（选修这一课程的都是亚洲人）传授些什么呢？他自己对这些朦胧的传说中的统治者都不太清楚，又如何能有什么东西传授给对这些问题更不清楚的学生呢？

新设置的东南亚历史教授霍尔的到来，才使他稍释孤独之感。1950年，霍尔开始向该学院的东南亚语言学系教师和研究生等做了一系列关于这个地区历史的讲演。霍尔满怀信心地进行讲演（这讲演为他后来编写的《东南亚史》一书奠定了基础）。但不知为何，霍尔教授的信心并未能感染本文的作者。他怀疑：是否任何一个英国人都可以用这受限制的语言和教学设备来确切地解释东南亚呢？（后来与戈登·卢斯的交往证明这文化上的障碍是完全可以冲破的。）

正确的道路或许是用倒溯的办法来掌握历史吧！即从熟悉的现在入手，通过一些较近代的事件去追溯那朦胧的过去。我于是决定按照这个办法写一本描述缅甸医治创伤经历的书。缅甸人现在正为独立，为发展民族的团结而斗争着，而过去又有着长期受双重殖民统治的经历：英国的统治和印度帝国的管辖。《缅甸联邦独立初期的研究》（1957年）一书终于问世了。但这不仅未能解决东南亚历史中存在的问

题，甚至适得其反。看来，把当前的问题作为一个必须分析的领域而花的精力太多了。悲剧的结局只能是背离历史学者的光荣职责，而变成一个政治学的教师。

我同样带着许多疑问和不能解决的问题来开始写这篇评论。首先，在这轻率的“东南亚”一词后边真的有一个完整的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实体吗？我认为这是主要的难点，是我们将要谈到的地区历史学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在这一从阿萨姆缅甸延伸到菲律宾的地区里，能像欧洲和阿拉伯那样的存在着血缘的同一性吗？

可以断言，在民间的确存在着把这些大陆与海岛联系在一起并与其邻国相区别的同一性或感念倾向。我着重谈谈两个独具特点的游戏：一个是缅甸语叫作“亲隆”的游戏。在该地区的村路边和院子里到处可见到这种游戏。玩者分为两队，玩具是一个轻轻的柳条编的篮球。玩法是用外脚掌踢篮球，尽力使球保持在空中而不落地。我从未打听过其比赛的规则，但我有一个浪漫的想法，即这可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比赛，全体游戏者都为一个共同的目标结成一个整体，而不是竞相把对方打败。另一活动是一种舞蹈（我根本不知道它的名称）。我看到的是由克伦族的妇女或菲律宾的姑娘表演的。她们手持竹条呈交叉的形状，音乐一起，竹条就毕剥作响，横竖交错，或打开或关闭。打开时灵巧的舞蹈者就跳进方块之中，不断踏步，当竹板快关闭时，她们又及时跳出。由此，我又浪漫地把这种舞蹈看成是东南亚充满厄运的宿命的缩影。倘若这些轻盈柔软的舞蹈者一旦跳错，这关闭的竹条定将夹坏她们嫩弱的踝骨。说来也怪，这两个奇异的游戏却把从未听说过他们的远房兄弟的各族人民连结在一

起。许多其他民间风俗与传统也可证明东南亚的农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当我们考查这一地区的上层建筑时，感觉到的却是异多同少。看来，印度、中国、伊斯兰国家或西方的遗留物已遮住了它的本来面目。

东南亚这一名字，正像它的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的名字一样，是个外来物。过去，欧洲地理学家单纯从地理位置来观察亚洲：阿拉伯大陆及波斯构成了近东（即接近欧洲），印度及其邻国构成了中东，东亚（中国、日本、朝鲜）则显然是远东。我们这一地区比中东要远些，是一较难处理的过渡地区。在给这一地区命名时有的人试图采用与其他国家联系起来给它定位的方法，因而称之为“外印度”、“小中国”、印度支那或南洋。⁽¹⁾二次大战期间，出现了两个相反的倾向：日本的占领使这一地区变成了东亚的一部分，即大东亚共荣圈的一个单位，后来，由于蒙巴顿决定将他的指挥权与对印度和印度军队的统治权分开而建立了一个东南亚盟军总部。⁽²⁾意味深长的是，东南亚盟军总部管理的地区是不包括菲律宾的。不知为何，历史学界一直不把这些用西班牙国王的名字命名的遥远群岛完全列入历史学之中。

与地区的一致性问题的紧密相联的是本地区的历史学者与编年史者的殖民主义或新殖民主义的观点问题。欧洲人到来之前，这里已有个别国家的学者与中国、阿拉伯以及其他亚洲的评论者编写的历史著作。这些传统的著作后为大量渗入的西方作者所吸收和贬低。远东法国学校曾审查并重新解释了古代与中世纪的年代纪与历史著作。当时的大部分西方职业学者都与这间学校有密切关系。描述——绝大部分是歌颂——西方对这一地区的占领的著作者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那

些“守旧的”作者。唯一的例外是一些美国的作家，即1776年的子孙们，他们愤怒地说，西方殖民主义者在道义上应该受到谴责。不论怎么说，舞台在亚洲，而演员却全是欧洲人。⁽³⁾“欧洲中心论”的错误在三十年前虽早已被识破（最早是G.W.洛赫尔，抑或J.G.德卡斯珀里？），但至今仍有许多西方历史学家还把东南亚看作是扩大了了的欧洲的围幕。⁽⁴⁾

在当我们着手考察东南亚这一新概念的产生之前，就其本身历史来讲，我想先特别提到一本著作，它的理论影响大于任何一本追随或属于殖民主义历史学传统的历史著作，这即J.S.弗尼瓦尔的《殖民主义的政策与实践》。当然，弗尼瓦尔主要功绩是创造了“复性社会”这一社会学概念（尽管他的追随者已极大地发展了他要创立的理论）。弗尼瓦尔认为，东南亚地区应属“热带”，缅甸与印度尼西亚，从地区上来说应称之为“热带远东。”⁽⁵⁾他的大部分精力虽倾注于反对殖民统治的斗争，但他对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的分析以及解决的办法却是在殖民主义制度的框框里构思出来的。他虽给殖民地设想了“自治制度”，但他未真正意识到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奄奄一息（尽管后来日本又占领过东南亚）。他虽设想过一个较好的更开明与更自由的殖民主义，但他规定的历史时限，既不是真正地回到殖民统治前的时代，也不明确地包括西方殖民者的正式离去。尽管如此，但他在论述世界经济对缅甸与印度尼西亚的影响方面，对后来的作者仍有重大的影响，许多人直接引用过他的著作。当然，他看问题也有错误，例如，他就曾过于简单化地强调开凿苏伊士运河对国际贸易的直接作用，这一点几乎为所有的

人盲目遵循。(6)

×

×

×

布赖恩·哈里森谈到他编写《简史》的原因时，态度十分谦虚，只简单地说是由于学生没有一本可供参考的教科书，因此，就一个人安心地干了起来。(7)因此无论在资料上还是在叙述上他都不声称有何独创。尽管他也承认“东南亚既未形成一个政治上文化上的整体，……就是在地理上……也未形成一个自然单一体”，但他还是将其概括为一个东南亚。(第9页)该书以殖民统治与欧洲影响作为描述的重点，全书将近五分之四的篇幅讲的是西方的统治。他把东南亚的近代社会描写得很先进。说明西方影响的两幅插图，一幅是荷兰人在雅加达修建的辉煌的办公大楼，另一幅是英国人在霹雳修建的水电站。但对日本人摧毁这些西方的堂皇的建筑却只字未提。另外，在结尾处，他以谨慎并略带含糊的词句赞扬了战后动乱中诞生的新型国家(当然，该书出版时马来亚尚处在英国统治之下)。要批评这位先驱者并不难，因为他没预料到在他的探索性的原著之后所出现的一切历史(和政治)形态的变革。这本书出版后成为出版商的热门货长达二十五年以上，由此可见该书的价值程度。

哈里森一书的主要“听众”是英语院校与东南亚高等学校的学生。D·G·E·霍尔的历史著作出版时，听他讲演的听众范围更加扩大，包括一些欧洲学者，尽管如此，但在五十年代初期，其所占比例仍然很小。当时美国记者还未学会识别越南，认为它仍是印度支那的一部分。研究东南亚的高潮还未到来，所以麦克米兰出版公司对出版这一次要地区

的历史书籍仍在踟蹰不前。可能他们估计，霍尔的大部头著作比哈里森的著作销售量要低得多。然而，据我所知，哈里森的较短篇的著作虽再版多次，而霍尔的《历史》却没有较近的再版本（到目前为止）。⁽⁸⁾ 尽管如此，该书仍是人们必读书中的“埃菲勒士峰”。

霍尔构思大胆，令人震惊。⁽⁹⁾ 他一开始就坚持东南亚的统一性与自主性。他决心不再使用那些用来强调这一地区文化依赖性的大印度或其他名称。他通晓法文与荷兰文，不懂亚洲古典语文，但他对一些著名的学者，如克朗、戈岱司、马宗达等却提出了质疑。该书内容浩瀚，立论精辟，学术地位很高。在目前专业化日益增强的年代里，他反复强调多面手的重要性。只在 H·A·L·费希尔的欧洲史出版（1936年）之后不久，我们不是就有了一部可与“地平线上的灯塔”相比拟的学术著作了吗？任何人都可对霍尔著作的每个细节进行挑剔，但谁又敢按照霍尔大胆勾划出的巨大蓝图去开辟自己的道路呢？

从时间的比重来看，霍尔比哈里森较重视西方统治之前与之后。据粗略统计，该书七分之三描述四方干涉，七分之四描述“土著的”东南亚，包括古代、中世纪与现代。霍尔对古代帝国及其文化的描述稍嫌单调。虽然他把各国王朝都“逐一不漏”地排列成表，但对该地区的发展趋向却触及不多。大部分内容是讨论考据及其解释，因为霍尔对考证要求非常严格。记得在一次会议上（1951或1952年），他与另一位研究东南亚的知名人士威克托·帕塞尔相遇。帕塞尔的《东南亚的华人》一书已被广誉为全面地研究这一人数最多的移民的首部著作。当然，他很希望能得到霍尔的赞扬，但

后者却只问他为何肯定地说马可波罗曾访问过吴哥，因当时此事尚未证实。对别人的批评，帕塞尔一向是毫不客气反唇相讥，但这次他却气乎乎地退却了。

在谈到西方干涉时，霍尔确实表现出十足的党派观念。约翰森博士评论他的国会报告时说：他“千方百计不让辉格党徒们占到上风。”有人觉得，霍尔也千方百计不让荷兰人在同英国人的冲突中占到上风。他确曾企图揭露荷兰殖民主义历史学家以顽固的态度对待莱弗士在爪哇的统治。霍尔的偏见难免遭到别人批评。他的著作出版后不久，弗兰克特拉格在评论中就责备他“用党派观念来表述英国的正义与克制精神”，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暗中保镖”。⁽¹¹⁾已故的丁昂博士也曾极为克制地评论他说：“霍尔，这位帝国教育处的成员，……当然要用英国官方观点来看待缅甸的历史”。⁽¹²⁾

在霍尔这一代经历过的作家，不可避免要采用一些过时的观点，这是可以谅解的。但难以接受的是，在西方殖民统治全盛时期，全部当地的“演员”都从舞台上不翼而飞。在霍尔笔下（西方历史学家都几乎如此），古代与中世纪时期，本地人物占领了全部舞台，只有一个外国人（如忽必烈）偶然出过场。西方殖民统治初期，仍可偶然发现一些东南亚的演员——现在人们称之为“抗战领袖”人物。后来这些人物都烟销云散，欧洲人接管了一切。及到殖民主义衰退时期，几个孤另另的本地抵抗战士又重新出现了，如菲律宾的黎刹、缅甸的沙耶山。最后，当一些国家重新获得独立时，欧洲人又突然不见了，书中的人名全都为东南亚人名所代替。在漫长的殖民统治的过渡时期里，本地的人们虽不见于记载，但他们仍确实存在在那里。预言家、诗人、造反者、魔

术师、企业家等人对该地千百万人的生活与信仰所起的广泛影响不但大于众多的殖民地官员，而且也大于霍尔《历史》一书中所描述的更遥远的宗主国的政治家及其他笔下人物。

我们的观点可能已改变，但霍尔的《历史》一书并未毁灭，也许是不可能毁灭的。该书第一版出版不久，一位同行就指出：“霍尔是当今唯一在书上不提马克思的历史学家”。的确如此。但萨尔基斯扬兹教授却告诉我说，霍尔一书的俄文译本已经出版，并附上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序言加以校正。⁽¹³⁾泰文的译本也在准备中。也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其他译本。霍尔仍在前进着，尽管我们这些比他年轻三十多年的后代已痛感他的著作过时了。

遗憾的是 J·C·范勒尔的《印度尼西亚的贸易与社会》一书出版稍迟，不能为霍尔所参考。在此之前，霍尔的《历史》一书已经出版了。范勒尔书中展示的对专门资料的异常通晓定会给他以深刻的影响。⁽¹⁴⁾范勒尔有如一颗陨星飞过东南亚的地平线。他大部分壮年时期是在荷印官员这一单调的岗位上渡过的。三十四岁时，他作为一名海军军官在一次爪哇海战中死去。他的书虽只是他要完成事业的一部分，但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创见：尽管西方打入了亚洲内部的贸易，但并未能立即改变这一贸易的性质。欧洲人的企业虽变成了发达的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在初期并未对其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就是在商人（或如范勒尔所说的商販）世界里，他们连第一流的商人都不是。这一切，对殖民主义的历史学家说来不啻为一场革命，因为他们都认为，当燕·彼德尔斯逊·昆一登上印度尼西亚的舞台，一场完全新型的竞争就开始了。而现在当我们认识到西方帝国主义并未能在东南亚创建

一个新的世界时，看来这一见解不令人感到震惊。虽然西方帝国主义可能已带进了一些很重要的新因素——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但当西方帝国主义被迫匆匆撤退时，幸存下来的旧世界必将获得新生，尽管它可能已被弄得支离破碎，失去了往日的荣耀。

范勒尔的事业刚刚在开始，他只能提供一些早期荷兰经济扩张的情景，假如他能得到一个学术的寿命，那么，他将做出比研究成果并不深邃和广博的弗尼瓦尔更大的成绩呢？，还是在荷兰殖民主义历史学的强大压力下被迫缩回头去呢？尚很难估计。实际上，他只不过是一个在东南亚历史上已经出现的和还将出现的象征而已。

在几乎整个十年里，能站得住脚的唯有哈里森与霍尔俩人的著作。这些著作都以垂死的欧洲殖民主义为背景，而共同的愿望都是“望彼安息”。已很明显，在东南亚里，民主主义制度与共产主义运动正相对抗，而我们几乎未看到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两位早期作家曾企图探索打开这一地区过去与现在大门的钥匙——极权主义。

本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外部世界已开始注视越南。兰顿·约翰逊获得了美国国会对1964年东京湾决议的赞成，这一决议实际上已被用来作为对北越的开战宣言。不久的将来，原被称之为“小中国”的越南很可能变成一个“小美国”。但未到六十年代后期，关于越南问题的论战已使美国学术界分裂成霍克与达夫两派。多数人倾心于推翻民主制度的军政权。美国政治学界一些头面人物把它们看成是“现代化”的力量，而鼓励对其进行援助。⁽¹⁵⁾少数的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应该将越南搁在一边。他们认为民族主义将是反对

国际共产主义的堡垒，并论证说：如越南被搁在一边，它最终将变成另一个南斯拉夫。这就是六十年代出现的历史著作新高潮的非常紧张的背景。

在新高潮中涌现出来的著作，有的实际上是塑造哈里森与霍尔的旧殖民主义的残余。约翰·卡迪在美国浸礼教会（该教会本身就是一家长式统治的慈善机构）的资助下，率先去探索殖民统治下的缅甸。当然，威克托、帕塞尔也曾经是马来西亚民政司的官员，乔治·戈岱司也曾是高级的阴险的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堡垒——远东法国学校的成员。

卡迪写的《东南亚历史发展》于1964年出版。他始终坚持地区性的观点，重视超越国界的影响与活动，他努力钻研上层统治人物与政治统治，并阐述构成人民生活的商业、移民、宗教、教育以及其他的经济、社会力量。他对古代与中世纪的描述，相对来说稍嫌短些，而其中大部分材料（正像他乐意地承认那样）系引自戈岱司的著作。400页关于西方统治的描述不如前一部分紧凑，而且也只限于描述西方列强统治下的某些单一的殖民地与地区。对这一现象的出现，不能只归咎于卡迪。因为对东南亚说来，西方殖民主义就是它们彻底分裂的过程。而南亚却不同，它经受（或忍受）了一百五十年的单一列强——英国的帝国主义统治，因此它经历的是一个统一与团结的过程。而东南亚则由于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与美国等多国的侵占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原由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南海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兴盛而建立起来的联系，已被西方的冲击割断。各国与里斯本、伦敦、海牙、巴黎、华盛顿的联系比本地区内各港口和移民点之间的联系更为重要。各地区被分割开来的

人民对各自宗主国的主人比对他们彼此之间的风俗更为熟悉。(16)

这一问题，卡迪或其他的历史学家都难解释，只有在对比的基础上正确地对待殖民统治才能解释清楚。然而卡迪却认为殖民统治是一积极的，甚至有益的经历。他特别赞赏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并经常惬意地辩解说：美国人呆在那里是为了菲律宾人的利益。他对英国的描述也同样体贴入微。例如，在马来亚问题上，他说：“（英国）接管的是一个东南亚最没有前途的地区。在暹罗与荷兰的两个世纪的霸权统治下它几乎已完全被人遗忘，但英国却把它变成了一个生产的繁荣的地区。”依他看来，这当然不是亚洲人的功劳，因为“温驯的泰米尔族劳工是懒散的，有钱的中国人是贪婪的。”他藐视本地区涌现出来的民族主义的杰出人物。在结尾部分，按照惯例他加上了一段有关殖民统治的结束语，回顾了历史教训并总结说：现在的东南亚仍要依赖向西方出口和“继续求援于工业国家”(17)他总的观点是：西方殖民统治是一个改造东南亚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才最后形成了现代的东南亚。

到目前为止，在长篇著作中，只有卡迪这本 657 页的巨著可与霍尔的《历史》一书（第一版有 870 页）比美。很明显，霍尔的著作仍是当前最有权威的历史著作。(18)为什么呢？从人们的兴趣来说，卡迪的书较浓，但从主要因素，即才能的高超与个人的威望来说，则为霍尔所独占。凡是认识霍尔的人都尊称他为“绝代名师”。(19)霍尔对自己的事业一向坚信不疑（虽然他并未流露出来）。正由于他有这样一个崇高的形象，而使人们对他一贯尊重，尽管有的人尊重的有些勉强。

威克托·帕塞尔的《1800年以来的东亚与南亚》是一位大作家写的一本小著作。帕塞尔生活负担较重，他甚至用艾拉·巴特尔（是否反驳的意思？）的笔名写书，以补助开支。这本书像似未经较大的努力而随便写出来的。书中所附地图很有教育意义，同时，该书能连续地追述印度次大陆、中国、日本与本地区所发生的各种事件之间的相互作用也颇为有益。此书有价值的评论不多，只是对他的宿敌菲尔德·马歇尔·坦普勒有讥讽，谴责他试图把马来亚的独立推迟“一千年”，这就无意中等于要把马来人与华人联合起来“去反对官方的政策”。⁽²⁰⁾

乔治·戈岱司所著《东南亚的形成》一书英译本出版于1966年，即法文原本出版后第四年。⁽²¹⁾他只关注大陆国家（马来亚除外），而且以古代部分为主。其写法与其他一些夸张地描述王朝与战争的著作完全不同。从该书里我们看到了整个遥远过去的壮丽景色的重现，这是当时社会与政治结构、内部的经济以及各种信仰制度的真实写照。如果有人问哪一本介绍东南亚史的最好著作，我就劝他读这一本。然而，该书在结构上有严重缺陷。他认为东南亚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国元朝的入侵为转机的，他把这一入侵视为十三世纪的危机，他论证说，这一危机招致了古“印度教化”帝国的崩溃，并为部族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与此相反，霍尔只把元朝的入侵作为一系列事件来描述，而不认为是一个全面的社会与政治的大变动）。

该书最后的100页，即叙述从危机之后到西方的统治的部份，给人的印象不如前几部分深刻，人们又被带进了一连串的王朝斗争与自相残杀的战争之中。另外，尽管他很熟

悉亚洲人的生活，并有某些独到的见解，但这位中世纪史的专家仍未能摆脱现代西方历史学家的沙文主义倾向。戈岱司把十九世纪早期的历史赤裸裸地描绘成：“一方面缅甸被英国一口口地啃掉，但另一方面，越南与柬埔寨却受到了法国的保护。”（168—169页）对帝国主义的评价又采用了沙文主义民族歧视的观点。

× × ×

现在，西方历史学家的年轻一代已开始提出他们的见解。尼古拉斯·塔林的《东南亚简史》于1966年出版。塔林教授对南中国海与太平洋之间各岛屿有专门知识，对南洋这一边远角落有独具地方色彩的见解，他运用这些知识与见解把各个（包括一些常被遗忘的）地区的细致描述与影响整个地区的主要力量的综合描述结合了起来。尽管该书所涉及的几乎全是欧洲的统治及其不幸的后果，但很明显，在谈到商业与种植业的发展时，也把本地人的作用描述了进去。同时，对民族主义运动的性质也有较理智的评价。顺便说一句，在谈到吴哥与远东法国学校时，塔林认为：“这过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处在欧洲的殖民统治之下……。它们也确实表明是伟大的，……对现代的东南亚民族主义也是一个助力。……但是，东南亚的一致性并不是由于这个经历或这过去的知识的推动而形成的。”（157页）塔林写的很谦虚，他在跋中建议：“应把这无人知的北部”（一个新的积极的观点）作为教育澳大林亚与新西兰学生的课程。

但后来，塔林的著作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另由约翰·巴士廷与亨利·本达合著的一本较为短的历史书却受到了较大的注意。（²²）在第一次东南亚史学家国际会议上（1961年

于新加坡举行），亨利·本达提出的论文引起了很大的震动。这篇论文出版较迟。⁽²³⁾本达雄心勃勃，想以他称之为“结构的、类属的探索方法”来弄清本地区历史的主要问题。尽管“用一个统一的文化整体来概括东南亚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108页）他大胆提出，“十三世纪的危机的出现并不是由于外部的侵略，而是由于以天神为中心的宗教遭到了农业的、农村的东南亚的反对，他们响应新的宗教势力——由僧人宣教的佛教和主张平均主义的伊斯兰教——农村。”本达欣然接受那时划分“大传统”与“小传统”的习惯划分法。他可能会弄清本地区历史学中一个急待解决的主要问题。他试图证实这一民粹主义的宗教势力正是现代民族主义复活的主要因素。然而，他又论证说：民族主义除了在日本占领“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之外，是不起什么作用的。（133页）

本达提出的东南亚史编写计划，尽管是暂定的、假设的，但他答应给人们以兴奋的精神和具有独到的探索，遗憾的是，随后发表的著作并未如愿以偿。该书在极其简单地介绍了欧洲人占领前的时期以后接着就描述西方的海事与商业活动。在这个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部分里也只是表面象征性地简述了亚洲人的反应。接着描述的是30页的对日本的占领的描述（这是该书最精采的部分）和55页的现代情景。他把这个地区的国家分为保守的、相对稳定的（只有柬埔寨，因它摆脱了其他大部分国家内部存在的苦恼）国家和患有农业社会弊病的革命政权。他在结尾部分预言说：“东南亚国家将再次沦为外国人的纯粹牺牲品。”（220页）看起来，六十年代后期栖息在美国阵营里的阴郁情绪已吞没了这些著

名的学者。

其后不久，一本内容更较广泛的著作出版了。作者是一个英国人，长期定居在马来西亚，并（听说）信奉了伊斯兰教。这即D·J·M·塔特计划写的长篇著作《现代东南亚的构成》的第一卷。⁽²⁴⁾在序言里，他谈到这本书“将按照与这一国家（马来西亚）及其邻国关系的密切程度来安排其叙述的内容，”因此“马来人的世界”（即海岛东南亚）占365页之多，而缅甸、泰国与印度支那则只占154页。描述的时期从公元1500年起到20世纪初。该书主要是为马来西亚读者所写，与其他书相比，较多表达出马来人是被殖民化的情感，而不是（自觉或不自觉地）采用通常的殖民主义者观点。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的是各国和各族人民宁肯殊死地反抗侵略，而不是坐等大国的吞并。他还把一系列较大的苏丹国，如柔佛、彭亨、婆罗洲、苏禄、亚齐等作为历史调查的个体深入进行考查。应该记住，对十六世纪或十七、十八、十九甚至二十世纪初的人民说来，这就是整个的东南亚。这一系列的材料表明它们的历史正是一个长期反抗西方的历史的殿后战；从遍及大东群岛与苏禄群岛的艰苦战斗到最后的棉兰老抗美战争，正如塔特所说：直到1915年，“马来西亚世界的最后两个独立的苏丹国才接受了他们的厄运。”（216页）然而直到今天，即1980年，棉兰老的起义者不是还在继续反抗一个令人厌恶的外部力量的压迫吗？

我们从塔特再转到两位为美国大学生编写教科书的作者：斯蒂芬·沃索（《东南亚的产生简史》（1975年））与利·A·威廉斯（《东南亚史》（1976年））。他俩共用资料。当时正处在越战后的幻想破灭的精神状态之下。威廉斯说：